

搭上哈佛燕京学社列车的华大（下）

金开泰

二、在哈佛燕京学社列车上的华大

无论是哈佛或燕大初衷都只是为了争取霍尔的遗产，谋求自身的发展。但是哈佛在与霍尔遗产公司接触，了解霍尔的遗愿后才产生了在东方的中国寻找合作者，发展哈佛相对落后的东方文化研究；燕大司徒雷登一开始就在争取得到霍尔这部分基金的支持，但也只有在北大退出后才得到了机会，而初创不久的燕大，要独立承担霍尔研究东方中国文化的遗愿也还有很大的路程，因此在中国寻找更多的合作者就成为双方共同的意愿。加之遗产董事会在分配使用遗产过程中，与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校董会和一些大学的美国校董也有所接触，对中国基督教大学也有一定了解，有的大学也在争取霍尔基金的资助。因此三方在讨论基金的分配使用中接受了司徒雷登燕大人士的建议，同意学社的工作以北京为中心，同时向其他一些教会大学提供资助，并在可能的条件下与清华大学和国立北大等本地机构合作研究中国文化。除雅礼（Yale in China）外，遗产董事会基本上答应资助燕大推荐的能代表中国北方、南方、东方和西方著名的学府燕京大学、岭南大学、福建协和大学（Fukaen Cheistian University）金陵大学、齐鲁大学（Shandong Cheistian University）和华西协合大学（West China Cheistian University）。（1）这就确立了1928年哈佛燕京学社成立时基金的安排，华西大学也就搭上了这一列车。

1931年司徒雷登召集了六校会议，华大毕启、方叔轩参加了会议，被选入学社在北京的中国顾问委员会。霍尔，华大并不默生。早在华大向中国政府立案之前，毕启校长就曾从霍尔地产公司（Charles M. Hall Estate）获得了50万美元的资助。进入哈佛燕京学社后1929-1930年学社每年付给了华大1万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中国人文学的教学，博物和出版，占了大学年度收入的11%。

（2）。1943年的资助占常经费的9.8%。1949年占12.87%。（3）

华大于1910年3月11日开学，老实说，只有11名学生。20年代全国掀起了“非宗教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的高潮，尽管传教士是依据条约而来，又得到四川总督的支持，袁世凯的嘉奖，但难免的冲突却影响了她的发展。1922年聘到留

日学生程芝轩到校任教，还兼任文牍、图书馆、中文出版部主任、总务主任等。1928年在他的努力下设置中国文学系，任系主任，并兼史系经学教师，得到美国霍尔赞助基金20万美元，作为发扬中华文化的专款，确立“发扬中国固有学术兼收罗古物评确考证，贡献于海内外”的宗旨。但四川地处内陆，多数只能聘任中国传统的文化学者，分别担任和开设经、史、子、集、考古、修辞、诗词等课程。毕启、方叔轩参加六校会议回校后，1932年正式建立文学院，成为文学院下的一个系。结合为立案的院系调整中，仿效燕大成立了华大哈佛燕京学社委员会，负责指导和监督相关工作及经费使用。确定：国文系的教学与研究，图书馆的建设，博物馆的发展及出版工作。各自的目标分别是：国文系：培养学生在中国历史、文化、文学、艺术、哲学方面的基础；图书馆：为教育目标及学者研究提供文献资料支持；博物馆：以搜集的资料展示说明中国西部地区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历史文化发展，并希望发展成为国际研究华西地区各民族文化的最好的博物馆；编辑有《华西学报》。国文系1935-36年有专任教师程芝轩、钟稚璩、杜奉符、朱少滨、陈家骧5人，另有兼职教师林山腴、龚向农、李培甫、李炳英、庞石帚、彭芸生、陶亮生、刘藜仙、赵少咸、葛维汉10人（4）。无论是教师阵容，所开的课程与哈佛燕京学社要求的运用西方科学方法研究、保存和理解中国文明的宗旨有差距。北平办事处执行干事博晨光1935年在华大讲学期间，于4月24日的文学院会议上指出：1、对中国文学系的建议：a，学生应同他系学生有同等之英文程度，以便采取近代科学方法研究国学并用英文介绍中国学术于西洋各国；b，将中国哲学课程列入哲学系，中国历史课程列入历史系，中国文学系只授纯粹文学课程；c，教学法：中国文学课程各校多采取按文解义之讲解式，此为各校之通弊，若能指导学生研究，学生各自阅读书籍在讲堂上与教师讨论，并用新的眼光研究中国文化，学生获益必多，且可提高学生对于国学研究的兴趣。2、建议交换教授：几与哈佛燕京学社有关各校若能举行交换教授办法，彼此皆可获益；3、此地中国文学系应利用博物馆所收集的材料研究中国的历史与文化；4、民国25年暑假燕京大学举办一夏令讲习班，欢迎中学及大学国文教员与当代名流研究国学问题及国学教授方法，希望贵校亦派人参加。（5）叶理绥1937年来考察后评价是：该校所研究多数仍沿袭旧的传统方法，相关学术成果缺乏学术价值。这与该系教员薪酬待遇较低，难以吸引更多优秀的学者前来任教不无关系。尽管编辑出版有《华西学报》，但它严格意义上并不是一份学术性很强的刊物。（6）1939年又收到洪业转去一位华大教授

的意见：中文系里“有很多无用和守旧的人，他们认为背诵诗歌比什么都重要，对科学的方法根本不了解，他们并不细研学生论文的内容，而是评论结构；教历史却不关注历史本身而让教学活动成了文学作品赏析，轻视对检索系统的使用，并宣称甲骨文都是假的”，哈燕社要求华大重组人文学科项目，虽遭到了激烈反对，但还是将科研任务转到中文系和考研博物馆，重组了中文系，加强了本科项目。（7）随着抗战知识分子的南迁。1937-1938年增加了郑德坤、唐君毅，其后陆续有闻在宥、许季葑、沈嗣庄等。1943-44年有教授闻宥、刘朝阳、杜奉符、李炳英、邵潭秋5人，讲师唐文播、蒋大沂、刘念和、徐中舒、牛光夫及指导教师甄尚灵；采取必修与选修，调整学分数量，加重课后学习，设置了奖学金。（8）

社长叶理绥和哈燕社理事会都十分强调合作院校之间要加强协调力度，在华西坝上正是三所大学协调教学，利用彼此优势的良机，并在资金分配中给予支持。1940年哈佛燕京学社25万美元紧急资金与持续发展的分配中，分配给华西大学联合群中，齐鲁大学14000元，金陵大学25200元，华西大学16800元；专列了一笔用于联合工作的24500元。在其他机构中给金女学院14000元。（9）联合各方经过当局，“每周至少四校长例会一次，协商关于行政、财政、教职员待遇及有关公共事宜。每月有四校教务协会，由四校教务长、注册主任会商关于授课的时间安排、招生考试等问题；同样亦有训导长协会，磋商关于学校训导事宜。”这样在校历、招生、开学上课、考试、放假、毕业、运动会等学校的重大活动，甚至工资标准大体统一协调。五校文理各科相同的，根据师资的专长与特点，统一安排，分别开课，允许学生自由选课，学校承认所读学分。1944年又确定各相同之系在开设课程上应合简为一，但仍维持各自之学生和教员；各相同之系应有“划一”之课表，各课以开设一班或一组为原则。中文系的合作：本系所办一年级新生国文，现与友校取同一标准，并用同一教材，此项教材之编印，即由本系主办。本系与友校自去秋起，成立一“五大学中国文学系常务委员会”，由本校担任主席，每学期开始时，彼此所设科目皆曾会商，除必修课外，力免重复，平时并每月开常会一次，商讨一切，亦均在本校举行。（10）故虽在战时，学生都在逐年增加，教学质量又能得以保证。

到1949年已有毕业生140余人，其中1937年后的100余人。有教授副教授讲师12人。所承担本科课程林山腴教授（史记），李培甫教授（诗经、文字学、训诂、韩文）、庞石帚教授（苏诗、诗史、文学批评）、闻在宥教授（声韵学、

西文汉学名著选读)、缪彦威教授(诗选、词曲选)、罗玉君教授(小说戏剧)、杜丛林教授(中国文学史、文选及习作、庄子),讲师罗仲华(应用文)、副教授王仲镛(读书指导),罗玉君、林名均、李国瑜、郭祝崧分别担任文理科一年级普通中文教学。(11)其发展是相当大的。

在高级人才的培养上,陈家骥、郑德坤和蒙思明在燕大取得硕士学位,郑和蒙被选到哈佛升造取得博士学位。

郑德坤(1907—2001),福建厦门人,1926年考入燕京大学,1931年获文学硕士学位,留任燕大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员,1941年获美国哈佛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管理博士学位,回校继葛维汉出任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1951年应聘前往剑桥大学任教。1974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继续工作。获不少殊荣,如剑桥大学授予中国考古学荣休教授、鄧夫森学院(WolfsonCollege)荣休院士、“瑞典远东考古奖状”。1981年“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1985年被选为英国学会通讯会士,为远东第一人膺此殊荣。(12)



蒙思明(1908—1974),四川盐亭人。1933年华西协合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任助教。一方面给学生讲授西洋历史和中外地理,一方面作哈佛研究学社的研究工作。1935年入北京燕京大学研究院历史部进修中国历史,1938年以毕业论文《元代社会阶级制度》获燕京大学研究院文学硕士。北平沦陷后,重回华西大学,任讲师、副教授,主讲西洋近代史、魏晋南北朝史和史学方法。1941—1944年作中英庚款研究员。1944年受学社资助进入哈佛大学升造。他选习德、法、日等国文字,并继续进修俄国史、美国史、日本史和中国近代史。1949年以《综论各国事务衙门的组织和功能》的学术论文,获哲学博士,并有《北金俄罗斯使馆考》和《瑗珲条约的签订》两文交付哈佛大学。1950年至1952年任华西大学哲史系教授、文学院院长兼外文系代主任,授史学方法、美国历史等,院系调整后,历任四川大学副教务长、教务长和历史系教授。(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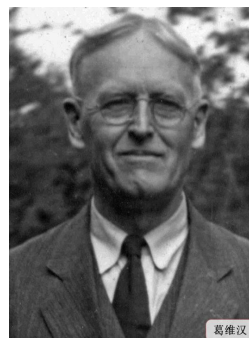


陈家骥，1931年华大毕业，1933-1935年在燕大攻读硕士，由郭绍虞先生指导，研究主题是《古代《诗经》评注评论》；1935年受容庚先生指导，研究汉代郑玄。回校后在中文系任教。

华大的博物馆是哈佛燕京学社在华大取得的最杰出的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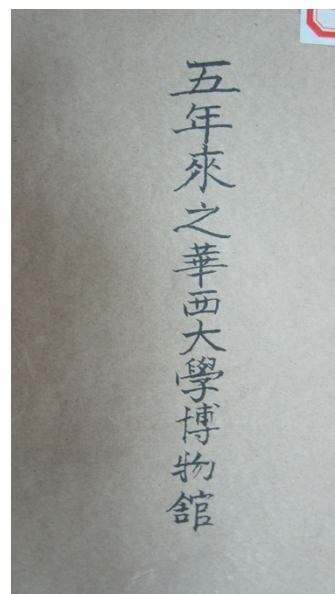
华大博物馆始于1914年戴谦和在毕启校长支持下，得到陶然士、叶长青合作建立的博物部。其后经搜集和接受捐赠，到1931年已有藏品6000余件，1928年华大加入哈佛燕京学社后，学社鉴于博物馆的重要，于1932年秋派葛维汉来校任馆长，将懋德堂二楼建为陈列室。通过考古、组织考察，广泛收集，丰富藏品。1934年3月1日，葛维汉、林名均在广汉，进行了日后三星堆的首次发掘，获得玉、石、陶器600余件，当地政府全部捐献给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

葛还十三次到四川的藏族、彝族、苗族、羌族等地区进行考察。对少数民族的文物进行了系统的收集、整理、研究，并吸取了美国哈佛皮特第博物馆和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的作法，建立一套完整的馆藏目录，分类、陈列，组织展示，每年都要接待上千的参观者。他在西方的前沿杂志上发表了数十篇文章，使他跻身于世界近代人类学杰出学者的行列。（14）



1936年哈燕社再派文学硕士，学社研究员郑德坤来大学任教，主讲中国历史外，在博物馆主持田野考古及整理博物馆。1941年回校继葛维汉出任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1946年他作了“五年来之华西大学博物馆”演讲，进行了一次总结。五年中他与冯汉骥等合作，在4个地方开展发掘工作，一个汉墓、一个唐墓、王建永陵和文庙旧址。他还进行了若干次的外出考察，收集了大量的文物标本。确定以研究边疆问题为中心，筹备成立研究室，对馆内文物进行了研究。按所搜集的石器文化，阐述了四川史前文化之演进；从所收集的陶器和其他古物阐述了四川历史的发展；此时馆藏品大小计三万余件，在研究的基础上改进馆内陈列，将两万多件古物按中国石器与雕刻、中国金属器、四川陶瓷器、华东华北陶瓷器、西藏文物、西南民族用具、其他艺术品七类陈列展示。除服务于教学、经常展示外，还举办了几次特别展览。完成了博物馆馆藏目录

工作，出版了手册丛刊五种，油印丛刊九种，专刊一种。翻译论文二种。他要使华大博物馆成为“中国标准博物馆之一。……成为一近代化教育圣地，华西研究之中心，甚至国际学术研究之大本营。”1943年获中央研究院特别奖金15000元。1939年起任边疆研究会编辑，1940—1947年一直担任学会秘书，使博物馆真正成为学会活动的基地。华大博物馆也被拉铁摩尔称为“可以列入世界上为数很少的几个先进博物馆的行列”。郑先生还注重为博物馆培养人才，他的研究生成恩元后来也对博物馆卓有贡献。（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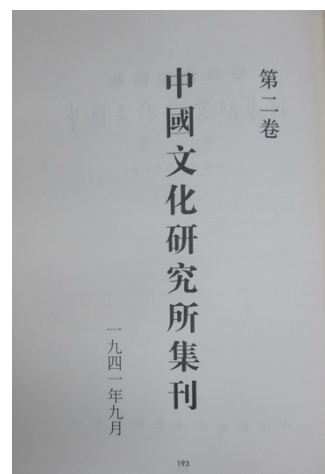
华大图书馆成立于民国三年。程芝轩曾向罗氏好一斋商借25000册中文古籍寄存馆内，后又得到柯里斯（J. Ackerman）、布顿（Stephen. O. Benton）及四川绅士等陆续捐赠，藏书数万卷。1927年迁入懋德堂，1928年获哈佛燕京学社支持后，加强了采购与收藏，1932-33年程芝轩曾到上海、北平等地采购了474种，11133册。截至1945年止，馆内收藏中文图书137199册。收藏中以四川方志为最多，260余种，达142县，次则是珍贵的古籍刻本、抄本。馆藏元代刻本2种，明刻本30多种。

至于在研究方面，客观的说，战争对华大既是挑战又是机遇。一方面在战争的各种困难下，不得不为兄弟大学的南迁提供帮助，华大成了几个大学的家园，获得了共同“发现西部”的无以伦比的机遇。另一方面在知识分子大迁移中，扩大了人才的聘用面，使许多具有现代视野、掌握西方现代科学方法的知识分子能进入学校。学校为吸引、留住人才，提高水平和校誉，适应国家抗战建国的形势，开拓西南边疆文明，虽与哈佛燕京学社的要求不一，依然成立了研究机构开展研究。实践证明是有成效和历史意义的。

1937年春，华大聘到闻在宥先生来大学任教，他虽是自学成才，但经历广泛，东西文化智识渊博，1940年在广益宿舍中文系成立了“中国文化研究所”（后直属校长办公室），他任所长，1943年任中文系主任，接办前后，又兼任大学博物馆



馆长。中国文化研究所聘请韩儒林、吕叔湘、刘朝阳等为研究员，陈寅恪、吕方桂、董作宾等为特约研究员。开展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等多方面的研究，主办《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定期），出了9卷，刊入84篇文章。除中文外，广泛采用英文。《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论丛》（不定期），文字较多的专著，则以《中国文化研究所专刊》印行，共出单刊7种。闻先生在其中发表了15篇语言学方面的论著，被陈寅恪称为“信为吾国此后治本国语言文字之学之楷模极有关系之文也。”其他主要撰



稿人有韩儒林、傅懋绩、傅吾康等。1941年接受了叶理绥的建议金大、齐大、华大合办《中国文化研究所汇刊》，1942年燕大来成都后亦参与了联合办刊。

《汇刊》到战争结束共出版了5期，刊发了78篇文章，（战后出版5期，1951年10期之后未再出版）发文较多者有徐益棠、闻在宥、刘铭恕、吕叔湘等，涉及历史民俗、语言文字、文学、艺术、民族、考古等多个领域，被德国汉学家傅吾康称为是与傅斯年主

持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的刊物同样重要。（16）

1941年华大聘到了李安宅和他的夫人于式玉。李曾在美国师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学院人类学系及美国历史学派创始人博阿斯的两位大弟子克娄伯和罗维及耶鲁大学人类学系著名人类学家兼语言学家萨皮尔学习。1935年到新墨西哥州的一个名叫祖尼（Zuni）的印第安人部落进行民族学调查。写成《印第安人祖尼的母系制度》（英文本），详细叙述了祖尼部落母系



制度的结构与演变，至今犹为国际同行专家所引证。回国后又在甘肃拉卜楞寺历经三年。与夫人于式玉广泛开展藏族社会调查。1942年华大在社会系成立了“华西边疆研究所”，所长由校长张凌高兼任，副所长李安宅，主持研究与考察。研究所与“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相结合，研究对象是西南各民族，而其重点则是

藏族。会同社会系蒋旨昂等，又特聘了藏学家任乃强、谢安国和刘立千等来所工作。谢安国迭次陪同西藏喇嘛与英印学者入藏出藏。刘立千是谢先生快婿。李先生从德格购入大批经典史籍，嘱二人检校整理，翻译，将自唐以来西藏政治史事，教法源流，名人年谱，摘译整理，成为巨著。先后出版有《印藏佛教史》与《续藏史鉴》、于式玉与玉文华编《西北民歌》等书。使华西协合大学成为拥有关于西藏问题研究资料最丰富的单位之一。西迁的金陵大学早在1930年就成立了中国文化研究所，1941年又建立了边疆社会研究室，有李小缘、商承祚、徐益棠等一大批研究人员。燕大南迁后又有林耀华、马长寿等人参与，这样在大家的协同下华西的边疆人类学研究达到了鼎盛时期。被后世称为“华西人类学派”。李安宅自己发表了《拉卜楞寺的护法神—佛教象征主义举例》、《西康德格之历史与人口》、《论边疆服务》、《边疆社会工作》、《宗教与边疆建设》等一系列研究论著。还用英文写成了20万字五章的《藏学宗教史之实地研究》，经牛津大学托马斯校订，林顿作序，美国耶鲁大学出版部出版，晚年，李老将保留的手稿副本，进行了翻译和修订。被称为“在此之前，还没有看到过象这样详细而深入的报告。”（17）

1940年国学大师钱穆受顾颉刚之邀，到齐鲁大学重建国学研究所，1943年9月钱穆受罗忠恕院长之邀任华西协合大学历史系教授，先后招收了研究生20余人。流转西南期间，1940年6月钱先生完成了著名的《国史大纲》，全书八编四十六章，共五十余万言，确立了中国现代史学大师的地位，先后在华大发表了多次演讲。他还在张其昀主编的《思想与时代》上发表了40多篇论文，后增补辑为《中国文化史导论》，竭力推崇中国文化。（18）



1942年11月19日由华大文学院院长罗忠恕发起，钱穆、蒙文通、肖公权、顾颉刚等积极参与正式成立了“东西文化学社”，延揽和聚集了国内外专家学者48人为基本社员，其中多数为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又有李约瑟、艾格斯顿、巴敦、达兹、齐尔门等国际友人参与。章程规定以“联络国内外学者，以客观的批判精神，探讨中西文化之价值，并直接交换思想，共同努力于文化之交融及新文化之建设为宗旨。”在推动中国文化的研究，中外文化的交流上都起到

了积极的作用。甚至对尔后李约瑟完成他著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按钱穆先生所说“亦不得不谓有当时之影响”。

华西协合大学被哈佛燕京学社选为合作者是有其独特的环境与条件。华大是由五个教会合作按西文现代规范建立起来、雄踞于中国西部的一个知名大学。在中西融会中，有利于运用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与方法，在重塑中国文化中有其独特的优势；早期的确由于地域的封闭，中国文化现代研究的基础较为薄弱，师资力量不足，在哈佛燕京学社“黄金十年”期，学术上没有产生较大的影响。但在抗战的特殊时期，知识的大迁移，给华大提供了极好的机遇，在获得哈佛燕京学社的支持下，学校增聘专家学者，与内迁大学共同开展教学及“发现西部”的研究也取得了前所未有、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为中国西南的开发，民族认同感的增强，社会的文明进步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为中国的考古学、人类文化的发展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也为大学文理兼备，医学为重，基础雄厚，特色显著的长远发展，建立了坚固的人文基础，从而跻身于西南的知名学府。虽然历史的变迁，物去楼空，地是名非，但回溯历史，我们依然庆幸搭上了哈佛燕京学社这一列车，为之兴奋。

参考资料：

- (1) 樊书华：燕京大学与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美国研究》1999年一期)
- (2) 樊书华：文化工程：哈佛燕京学社——中国人文学科的再建（1924-1951）)
- (3) 秦和平（华西协合大学经费问题初探 1910-1950）)
- (4) (6) (8) 王蕾的《图书馆.出版与教育:哈佛燕京学社在华中国研究史(1928-1951)》
- (5) 华大校刊 1935年5月10期)
- (7) 樊书华《文化工程：哈佛燕京学社与中国人文学科的再建》)
- (6) (9) 陈滔娜：哈佛燕京学社研究——民国时期院校合作的成功个案)
- (10) 校刊 44年复二卷4、5期本校与友校合作情况)
- (11) 华大校刊 1949年4月22日文学院特刊李国瑜中文系概况)
- (12) (15) (16) (17) 灵秀华西坝：华西人类学派的各路精英
- (13) 《灵秀华西坝》：华西儒林诸贤
- (14) 《灵秀华西坝》：揭开三星堆遗址考古序幕的葛维汉
- (18) 《灵秀华西坝》：齐鲁国学研究所的大师